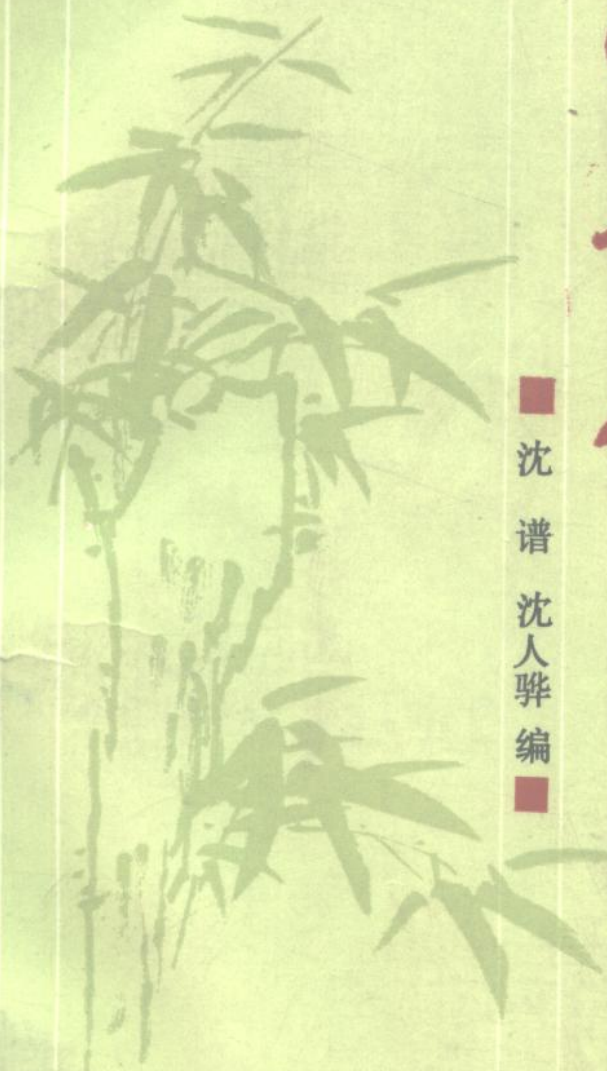


沈鈞儒 年譜

■ 沈 譜 沈人驊 編 ■



沈 潜 沈人铨 编

沈 钧 儒

年 谱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燕妮

沈 钧 儒 年 谱

沈 潜 沈人骅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通县北窑上装订厂装订

*

1992年5月第一版·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375 插页：6 字数：346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034-0560-0/K·363

平装定价：7.20元



1948年5月8日摄于香港浅水湾



1887年4月全家在上海合影。左起：沈钧儒、长兄保儒、母潘德琬、三弟炳儒、五弟彬儒、四弟恺儒、父沈翰。



一九一二年与夫人张象徵合影。

任浙江省諮议局副议长时摄影。



留日时期摄影。



1920 年自广州回沪后与全家合影。



一九三五年与南京救国会领导人孙晓村（左一）、曹孟君（左二）和狄超白（右二）合影。

一九三七年在苏州狱室中，墙上悬挂亲书「还我河山」。



1937年7月31日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出狱前与前往迎接的家属合影。右一：沈钧儒；后左二起：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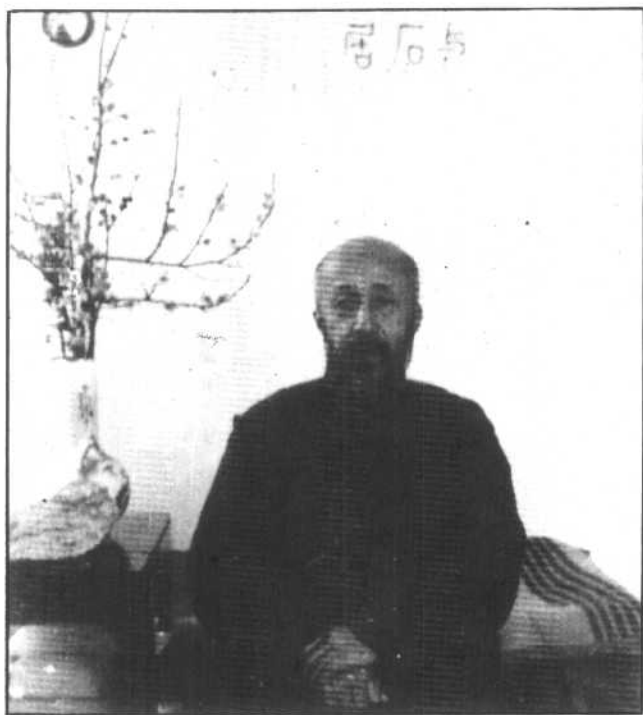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汉口与世界学生联合会来
华支援抗战的代表团团员合影。前排右起：李公朴、徐培
影、廖庶谦；后排：钱俊瑞（右一）、沈钧儒（右四）、柳湜（左一）。



1938年9月24日沈钧儒（前左二）与邹韬奋（前右四）、王炳南（前右三）
等代表武汉文化界到江西德安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持旗者为俞济时。

一九三九年摄于重庆枣子岚垭良庄卧室。



一九四〇年与叶剑英摄于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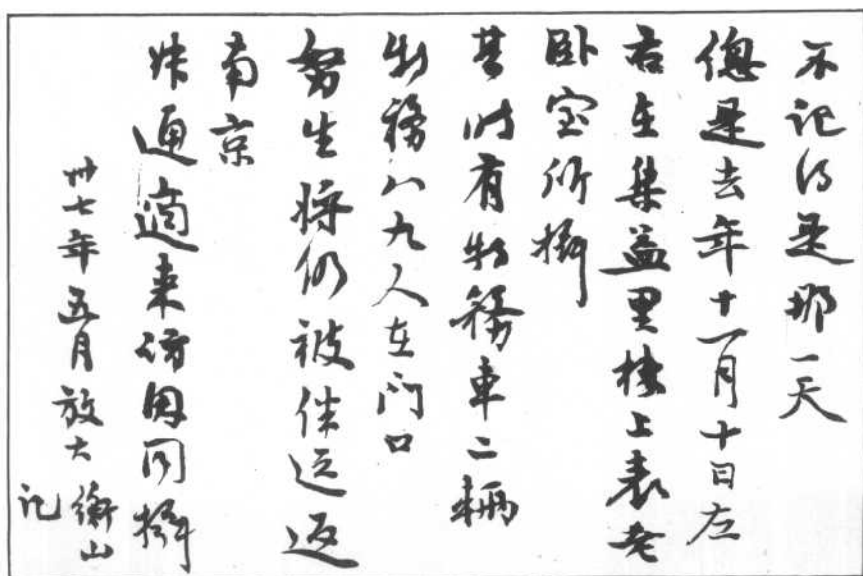
1942年4月4日沈钧儒（右二）与沙千里（右一）、林亨元（左一）、崔国翰（左二）在重庆联合开设“平正法律事务所”时合影。



1943年12月21日重庆文化、教育、妇女、法学等界及各党派人士假座百龄餐厅，庆祝沈钧儒（中）70寿辰。左：于右任，右：鲜特生。



1947年10月与张澜(左三)、罗隆基(右三)、陈叔通(右二)等民盟盟员在特务包围中同摄于张澜卧室。下图为先生为该照所书题照。





1944 年与张澜（左二）、鲜特生（右二）、李公朴（右一）合影。



1949 年 6 月在北平新政协筹备会上。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在民主德国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招待会时与威廉·皮克总统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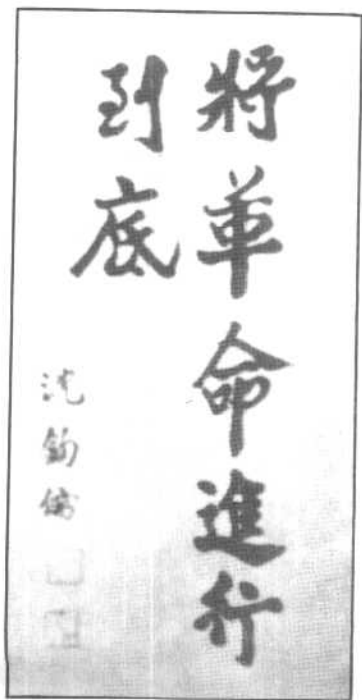


1961年9月18日
“九·一八”纪念日为
旅顺要塞题词。





1963年1月1日周恩来举行招待人大、政协70岁以上老人宴会时向沈钧儒祝贺90寿辰。



1963年4月23日为首都书法篆刻展览会题词。这是最后遗墨。

序 言

孙 晓 村

《沈钧儒年谱》问世了，这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系统中的一件大事。编者不仅如实地记录了沈老的一生事迹，而且着力搜集每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使读者可以看到沈老关怀民瘼，追求真理，不畏艰险，坚持奋斗的光辉事迹。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几个时代的历史资料以及沈老从清朝的进士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的一生，看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着何等艰苦曲折的斗争才得到1949年的真正的解放。这部书对今天的广大青年来讲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读物。

我和沈老开始来往和过从较密是在1935年。那时候，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而蒋介石政府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从事内战，实质上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路。在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各地救国会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在沈老等组织推动下，一马当先，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我当时为了筹组南京救国会的工作常去上海

与沈老、邹韬奋、章乃器、钱俊瑞等同志交流情况，分析形势，讨论问题，研究策略。日久之后，我发现上海救国会领导人之间有争论时，对沈老的意见比较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沈老有一次对我说，大意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救国救民的正确路线，我们以后必须照此办理，这样才有力量。”从那时起，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同年11月沈老等“七君子”被捕，一星期后南京救国会的曹孟君、孙晓村在南京被捕，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沈老等“七君子”恢复自由，沈老到南京任职，9月曹、孙恢复自由，我与沈老同住在南京鼓楼三条巷聚槐村，不久，我与沈老、沙千里、刘清扬等同志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力帮助下，乘冯玉祥将军的专车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整个抗战时期，沈老在重庆，我在东南一带，但音讯时通，沈老在重庆枣子岚垭的寓所，我也曾去过多次。抗战胜利后，我与沈老同在上海，我们恢复救国会的活动，直到沈老秘密离沪为止。在这段期间，我发现沈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愈来愈坚定，记得有一次沈老和我闲谈，谈到调停失败问题，沈老讲了一段深刻的令人难忘的话，大意是：“调停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那就无法谈下去了。在奔走调停中，我发现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主张正确，论个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建国以后，沈老不顾年迈体弱，仍奋力工作，到了晚年，自知记忆力衰退，乃用卡片摘抄党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上衣的口袋中以便随时阅读。从这些事例中，可以